

# “爱远方人胜过爱邻人” ——保罗·维利里奥论网络交往

作者：郑兴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 导言

互联网为今日的人类提供了新的获取信息的手段，新的完成工作的途径，当然，也意味着新的交往方式。作为一种交互方式，他在诸多方面不同以往：首先，在所谓的“赛博空间”之中，人们既可以维持原有真实身份相互交流，同时，也可以选择隐藏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和面目，使用因互联网而获取的另一身份（“用户”）与另一“用户”交流、讨论、建立关系。一些用户甚至因为共同立场或者爱好而形成虚拟的共同体；其次，它使交流彻底打破了空间区隔，地表空间中的任意两个人，只要借助于网络，都可以建立交往，即便他们相隔万里；其三，在打破空间区隔的同时，它也消灭了时间延滞，“交往”是“实时”的，无论他们在物理距离上相隔多远，交流中几乎不存在“延迟”；其四，这种交往也可以在两人彼此远隔的情况下实现“视听立体”，既看到对方的面孔，也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诸如此类的新特质，使得网络交互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交流，但是，同时也带来种种复杂的后果。

当互联网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法国思想家保罗·维利里奥即敏锐地感觉到这一个新兴媒介的重要性。此前，他已经一直对现代媒介保持跟踪研究，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陆续出版了《战争与电影》、《消失的美学》、《视觉机器》等著作，将视野集中在电影、电视等媒介手段，而他最为知名的“消失的美学”等重要概念也诞生自这类研究。很快，维利里奥也开始从他自身的哲学视角介入到网络的研究之中，在《信息炸弹》、《解放的速度》等著作中，他探讨互联网的兴起如何重新建构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维利里奥重点关注的、是网络给人际交互所带来的变化。本文即拟通过整合相关的文献，对此主题做出分析，同时结合其它学者的针对性的研究，做出比较和评价。

### 一、“远程托邦”：“近缘”的转换

在维利里奥看来，人与人的交往，意味着一种通向“近缘”（proximity）的可能。所谓“近缘”，就是两个不同的人之间建立的亲近关系。一个人构建和另一人的“近缘”，首先需要跨越距离障碍，而跨越距离需要借助于“速度”。相对于空间距离，速度越大，跨越的难度也就越小，构建近缘的难度也就越小，反之亦然。人类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载具”达成更多的速度，“载具”所带来的速度越快，也就越发能够轻易地跨越距离。正因此，维利里奥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获取速度的载具诞生后，往往也就意味一种新的“近缘”类型的诞生。因而，回溯人类历史，人类曾拥有不同类型的各种“近缘”：起初，人们首先因为自然地理环境的切近形成一个聚族而居的群体，这其中的近缘关系是一种“毗邻近缘”（immediate proximity）。后来，有了马车这种动物性的躯体提供了动力，人们便有了代谢近缘（metabolic proximity），随着汽车和火车等

交通工具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机械近缘”（mechanical proximity）。直到远程通讯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尤其是当因特网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可以与远方的人通过网络实时交流，人们便有了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电磁近缘”（electromagnetic proximity）（*Open sky* 58）。

电磁近缘带来种种的利好。因为除了不能身体直接接触，曾经只有“面对面”交往能够做到的事——即同时做到传达的瞬间性和视听二者的兼备，它也一样可以做到，却不需要让人们去跨越距离，以达成空间上的“面对面”。它把“交互”从空间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是，维利里奥强调，根本不存在没有“丧失”的“获取”。网络的便利令我们付出了代价，它废弃了身体和真实空间的关联。最重要的就是“地点”（site）的消失。这里的“地点”不单是几何学意义上的某个点，也不单是绝对的地理意义上的某个位置，更加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的“在世存在”所赖以扎根的所在。维利里奥受梅洛庞蒂的影响，他坚信身体和其所处空间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区隔，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用梅洛庞蒂的话说，“身体在世界之中，有如心脏在整个人体之中”。“地点”重要，是因为“地点”是我们的身体扎根的场所，而“扎根”不只是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驻留，而是涵摄了我们的在世体验。真正的“在场”，必须首先是人类身体在真实空间中的在场，它以感性经验为中心，以“活生生的当下”（living present）为基础，它必须是一种“此时”（now）、“此地”（here）兼备的存在（*Open Sky* 38）。只有在真实空间中形成“此时”和“此地”兼备的存在，人们才能感知自己，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也才能让他人真实地感知自己。只有当身体扎根于其所处的真实空间，才能通往一切真正意义上的“经验”。因此，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地点”不是现成在手的，只有在身体熟稔于其所处的真实场域的情况下，只有在身体与其所处场所产生实在关联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因而，理想的“地点”的代表，就是草原之于牧民，是森林之于猎手。

我们的“存在”需要“地点”，但是，这种“地点”能够形成，是因为地球重力施加于我们的身体，束缚了我们任意行动的可能。在此，维利里奥认为，我们应该反转一贯以来的关于“束缚”/“解放”这二者关系的认知。“束缚”——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意味着障碍和弊端，去除束缚即意味着“解放”，意味着种种利好。因为重力的存在，使得距离对于地球上各个地点的人群而言便成了阻隔，因为跨越这种阻隔，需要与地球的重力相对抗，也即意味自身身体的疲劳。因此种疲劳，人类将重力视为束缚，才致力于发展出各种载具，让自己最大程度地摆脱束缚，快速便利地抵达目的地。但是，维利里奥认为，我们所忽视的是，恰恰是重力，造就了地球环境中种种存在物（beings）的固定性或速度的有限性，在此条件下，人类才能构建自身和这些存在物的关系，即能够稳定把握到这些存在物的重量、意义和方向。可以说，正是借助于行进中的疲劳，对人类而言，整个可感经验世界（world of tangible experience）才被赋予一种尺度（measure）、一种真切特质（life-size quality）（*Open Sky* 62）。

正因为维利里奥看来，脱离身体与“关联”，任何的“获取”和“抵达”，都没有意义。在身体的感官经验之外获取的所谓“空间”就是如此。比如，地球外浩瀚的宇宙空间，和人的感官经验之间不能发生关联。它最多算是一种“时间深度”的过剩（excess of time depth）。如果人类真的摆脱了所谓“束缚”，却不会有真的“解放”，随之而来的只能是现实感的丧失和方向感的丧失。维利里奥举例说，当宇航员进入宇宙之中，他们所感受到的，决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

和自身关系的眩晕（*vertigo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mselves*）。阿波罗 13 号的宇航员吉姆·洛弗尔（Jim Lowell）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飞船在快要抵达月球前，因为故障，他们被迫放弃登月，而如果他们向地球返航，可能燃料也不足以支撑他们抵达可以着陆的地外轨道，然而，所有人当场一致决定：宁可在地球外层被烧成焦炭落在地面，也不要被抛入茫茫太空之中。维利里奥认为，这个决定看起来是一种回到地球的渴念，但往更深处看，其实是一种对于回到真实空间、回到世界本身（*world proper*）的渴念，也即回到身体自身（*body proper*）的渴念，因为身体自身和世界自身本就是一体的。我们想象的“自由”，反而是“监禁”，而我们眼中的束缚，恰恰就是我们的真实感的来源，反而是一种“自由”（*Worst Politics* 43）。

也正因为这种理由，“赛博空间”在维利里奥眼中也同样是这样的“过剩”空间。网络传输中，“地点”已然不再存在，我们只能拥有“此时”，却没有了“此地”，也就是没有了身体在真实空间中的体验。赛博空间中的“人际关系”，在维利里奥看来，因此也是颇为可疑的。因为“具身性在场”是在世存在的最直接印证，而“远程在场”却脱离了身体和真实地点之间的关联，相比远程在场，对他来说，“具身性在场”更具有伦理优位（*Worst Politics* 81）。真实空间中的相互交往也因此应该比网络中的交互更为重要。然而，当前的现实是，网络交互越发流行，网络交互取得支配地位后，真实空间中的交互越来越少。如维利里奥曾说的，“最少行动法则”（*law of least action*）使人们在技术更新面前束手就缚，一旦有了新的“义肢”，使得他们可以以更少的对自身身体和感官的主动调动即可达成同样目标，人们立刻拥抱新的技术，而疏远原有的手段。比如电梯诞生以后，人们即很少愿意使用楼梯。有了网络，人们可以不需要移动身体、不需要和朋友筹划现实中见面的种种细节，即可达到和面对面同样的效果。因而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费劲心思、浪费时间去跨越距离，只为和朋友“见”上一面。

直接近缘（*immediate proximity*）让位于远程互动（*remote interrelationships*）。我们的社群体验被颠倒了。在这种语境下，以往亲人、亲戚既意味着“身边的人”，也意味着“最亲近的人”，但是在今天，我们感到和亲人、和亲戚没法沟通，却和某个论坛或者网站的“网友”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曾经，所谓的“朋友”，至少意味是在物理层面是切近的，或者说，至少是常常“见面”的，但是现在，我们和很多所谓的“朋友”甚至都没有见过一面，但仍可在虚拟空间中互相引为知己。我们和远方的人更亲近了，却和身边的人更加疏远了（*Open Sky* 59）。感情上的亲近，和真实空间的距离切近之间，已经发生了分离，二者之间已经不再有必然性联系。今天，网络交往使得尼采所说的“远离邻人而爱远方人”成为一种讽刺性的现实。我们已经开始厌弃“邻人”，倾向于亲近“远方人”，宁愿跟远方的网友聊最私密的问题、在远方的陌生人那里寻找亲密感。我们甚至讨厌“邻人”，厌弃身边的亲人、朋友，只是因为他们在场，他们会呼吸，会发出声音，他们让我们烦恼。远方的人却令我无须担心，我也可以和他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我可以任意选择那个“远方人”，乃至可以对其任意删除和切换（*Worst Politics* 42）。

因此，维利里奥称网络空间为“远程托邦”（*tele-topia*）（*Critical Space* 18）。此处维利里奥改造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utopia*）这一词汇，将“*topia*”（-地方）作为一个词根，和“*tele*”（远程-）这个词根结合。“乌托邦”强调的是“非实存”，也即强调的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性境域。但是，就像是“乌托邦”表征着一种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远程托邦”这一表述，也同样暗含了维利

里奥的反讽判断。因为“远程托邦”是通过远程传输技术实现的无地点的“在场”，也就是“远程在场”(tele-presence)。这里的“远”(tele)并不是“物理距离”上的“远”，而是一种“非地点性”，即真实空间中的“地点”在远程传输的技术背景下早已遭到排挤，乃至废除。这里的“在场”(presence)也早已不是具身性的在场，而是声音和影像的“在场”。“赛博空间”虽然构建了某个人们虚拟身份得以聚集的“空间”，构建出一个真实空间之外的共处，赋予人们种种交往的便利之处，但是这绝对不会是一种自由和解放。

## 二、远程性爱：赛博空间中的“两性关系”

在人际交往中，比如，与朋友沟通，身体接触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故而“电磁近缘”占据越发重要之地位也仍然容易理解，毕竟，网络交互已然能够地、实现在线视频聊天。我们因而也仍然认为，网络的实时传输对于真实知觉的挤压和重塑仅仅局限于“视听”的层面，身体自身的某些机能至少仍是不可取代的，比如，两性关系，仍应需要男女真实身体的互动。然而，维利里奥特别指出，这种认知是错误的，低估了网络和技术义肢的能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维利里奥就尤其关注了赛博空间中的“性”议题。他已经从中看到，性，作为最私密的交互，本应最为需要两具身体的同时在场，两具身体的切近联结，然而，在互联网兴起之后，连这一最私密的领域也会受到冲击。单纯的在线聊天的“网络恋爱”，已经不可思议地过渡到深及身体层面的“网络性爱”：其中，有的是在真实世界中本已是恋人，却因为一段时间的客观条件所致的空间阻隔，而被迫远程性爱，亦或是，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谋面、却也通过网络性爱构建联系的网友。但无论是哪一种，在维利里奥看来，都宣告着，网络对于近缘关系的重塑，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视听层面。

网络恋爱能够成为可能，当然只需借助于互联网、摄像头和麦克风进行实时聊天即可，异地的恋人/爱人，无论他们在真实空间中相隔多远，已然可以在赛博空间内进行声像兼备的网络互动。但是，限于声音和图像的实时互动还不能道尽网络交际的真实潜力。维利里奥一再提醒我们注意网络技术的控制论维度。他早就看到，首先，网络传输不仅仅是单纯的实时传递信息和图像，更要看到，它能够通过远程遥控技术和义肢的联结，使得远方某个义肢代替此处的人类身体，去完成某个动作。比如，人类通过控制陆地上的某台电脑，就让机器人在海底深处就随时受到操控，完成了海底某个角落的勘探。也就是说，所谓的“远程在场”(telepresence)，在今天，不单单意味着视听层面的实时供应和实时交互，更加意味着可以完成一种“远程动作”(tele-acting)，也即，不单单在赛博空间内部可以实现视听和交互，更加要看到，此端的指令发送出去之后，虚拟性的赛博空间和真实世界之间可以发生二度联结，即远方的真实世界，经由被遥控的义肢，被实实在在地“介入”了，并因此而发生了某种“真实变动”。

在另一方面，技术义肢的发展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强化，它们已经不单单是外在于身体的、为身体所用的对象物，而是直接嫁接于身体，和肉身发生深度联结。在今天，网络互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电脑、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这四者的组合，而是可以更加全面地整合传感器、数据制服、电子自慰装置和远程脉冲技术。当这一系列的技术义肢搭建起来，并连接上人的身体，它们甚至可以对人类真实的身体反应和情绪变化进行编码和解码，也即将其完全地信息化，再借助于网络这一通道和联结身体的电子装置，让两个本来不可相互触及的身体，

跨越真实空间的障碍，再度被联结起来。远程在场成了“跨越距离的触摸”（touching at a distance），或者说，远程触摸在场（tactile telepresence）。此处的身体能感应到彼处身体的节奏，彼处的身体也可以呼应此处身体的微妙变化（Open sky 105）。一种建基于空间分离的诡异的“性”被构建了起来。它不等同孤独的、幻想性质的自慰，因为双方都是以远方伴侣的真实身体为性幻想投射的对象，并且也都在身体层面和对方做到实时的相互呼应。但它又彻底颠覆了传统性爱的模式，因为它同样可以释放出完全不亚于身体真实联结而带来的肉体快感，却又不需要两具身体在真实空间上的切近。

网络性爱正是当代“近缘关系”变迁的极端呈现。“电磁近缘”意味着这样的心理转换：邻人/身边人的切近在场不再是愉悦感和安全感的来源，反而意味着不安、麻烦和不确定性。两性关系总也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另一个人真实身体的切近在场，意味着背后的种种义务和不确定性，意味着与性愉悦捆绑在一起的可怕赘余。对于“他者”（the other）的恐惧、对于“异己”（the dissimilar）的恐惧，已经胜过了性的诱惑和吸引。相互排斥已经压倒相互吸引。性，已被“恐惧”所取代。与此相对的是，网络既使两性交往免去了的真实空间中的麻烦，也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既然不必在真实空间中见面，真实身体所带来的“恐惧”也就不再存在。举例而言，近年来女性对职场和生活中的性骚扰的抱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那是另一具真实身体未经许可的趋近，这自然令她们担忧，但是，矛盾的是，赛博空间中的“骚扰”不但不会让女性反感，反而令她们愉悦（Open Sky 112）。当女性在微信和脸书中这种社交媒体中不断地收到异性“加好友”的请求，他么不会为此恼怒，反倒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因为她们既通过此种方式印证了自身对于异性的魅力，与此同时，网络又远远拉开了双方真实身体的距离。真实空间中异性遭遇的种种麻烦被最大程度地降低了。

如前所述，人类将地球引力视为“束缚”，地球星体被人类视为对抗其自身、并且限制其自身的“他者”，因此人类穷尽手段与引力对抗，通过载具制造速度，就是为了摆脱引力对身体的束缚，追求自己所想象的“解放”。在两性关系中，另一个人的物理身体，同样可能被我们视为一种束缚，两个真实身体间的切近共处，即如同是地球引力般的束缚，它既可意味着肉身快感和精神愉悦，也同样意味着义务和麻烦，但是如果有了网络和其它义肢后，无需借助身体的切近在场，既可以完成视觉和语言的交换，更加同样可以获得肉体的快感，真实身体的切近不再是快感的唯一来源。如果说种种载具已经将当代人从地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远程性爱”也将人们的“性”从身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它受到欢迎也是势所必然。远程性爱越发流行，切近共处已经不再成为必要，远程之性的虚拟愉悦（virtual pleasure of sexual telepresence）会逐步取代具身之爱的实在愉悦（the real pleasure of embodied love），它会对男女交往模式、乃至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

首先，男女之间确立恋人关系乃至缔结婚姻都越发轻松和随意。一个纽约的男性，和一个远在东京的女性，可以在从未谋面的情况下，就能够维持甜蜜的远程恋爱。再者，婚姻，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轨迹中的坐标，曾意味颇多，它意味着让两个人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维持稳定的家庭关系，共同生殖并培育后代，因而，它也是重大的抉择，需要审慎思考，更需要在真实空间中经过神父、抑或政府机构的见证。但是现在，除了“结婚证书”仍是一道无可规避的法律手续，婚姻意涵之“重”早已变为不能承受之“轻”。人们不再把“结婚”和重大人生事项及重要仪式的结合视为必要，“结婚”成了一种可以自己轻易操作的选

项，人们可以网上交换誓言、网上完成婚礼，乃至网上行房。早在 1995 年（这一年人类第一个在线约会网站才刚刚诞生），就已经有一对远程伴侣通过在线婚礼而结合为夫妻（*Open Sky* 108）。当婚姻之“结”如此轻松，其“离”也就同样轻易。网络恋爱和网络性爱对真实空间中的婚姻产生了冲击。人们往往会忘记，网络空间中相处的模式和真实空间中相处差别很大。网络爱侣营造出“甜蜜感”与“契合感”是如此轻松，不需要经历切近相处的种种磨合、适应和矛盾。当人们习惯了此种模式，人们也便容易产生这样的幻觉，即认为现实婚姻也应该维持此种“满意度”，他们对于现实婚姻的满意阈值（*satisfaction threshold*）就被无形中提高了。一旦真实相处不能达到这样的心理预期，婚姻便容易走向破裂。亦或，婚姻中的男方和女方，突然发现，和远方异性网友的相处是如此愉快，而身边的那个人却面目可憎，在这种“对照”之下，婚内发生不忠行为的概率即会上升。离婚率的增加因而也会发生。

维利里奥指出，这一趋势不可小视，它会带来人类家庭机构的变化。从农业时代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整个大家族群居，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后，出现了“小布尔乔亚家庭”（*bourgeois family*）——一家三代人共居，19 世纪以后，“小家庭”（*nuclear family*）——仅由父母和子女构成的模式出现，且越发普遍。从今日往后，我们将会看到，“单亲家庭”（*single-parent family*）将会越来越多。维利里奥甚至还预言，“远程之性”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甚至还将导致地下性交易的变迁。曾几何时，固定在某一个“局部空间”的“站街女郎”，因为电话传输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达，被更为灵活迁移的“应召女郎”所取代，今天，随着网络性爱成为可能，可以想见的趋势是，“应召女郎”将会像以前的站街女郎一样逐渐消失。将来必然是在线远程性交易的年代。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越发流行的“网络直播”中，已经出现了有“裸聊”和“性直播”这样的色情内容，其实就已经是这一趋势的前兆。在不久的将来，当触觉发聩技术越发发达，网络远程性交易必将到处流行（*Open Sky* 109）。

### 三、网络与当代城市政治

赛博空间重塑了人们的近缘关系，也必将改变“共同体”的构建，进而当代城市的政治生态。

维利里奥指出，政治（*politics*）的希腊语词根就是城邦（*polis*），这说明从城市建立的开始，政治和城市空间之间就已经密不可分。城市，从其起源来说，曾经意味着一种建立在共同地点之上的聚居。古希腊的城邦即是如此，它以其自身的广场、市集和论坛，提供了政治所以能够发生的舞台：将不同的一群人，拉入到同一个场所，聚合到一起，发生接近，进而发生辩论、反思，做出决断。这就是城市的政治。所谓的“公民”（*citizen*），也就是在同一个实体空间中的聚合在一起的人，也即所谓的“共同体”内的人群。共同体之内的不同公民之间之所以有着相互认同，之所以会认为“我们是同一个城市的人”，也是源自于此。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政治所以发生，首先需要有一个居民共同居留、切近相处的真实场所，一种地缘意义上的稳定空间。

但是，在今天，空间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高速的运输、以及网络的实时传输已经逐步架空了城市的真实空间。维利里奥认为，速度是考察城市变迁的关键维度，速度的变革实际上支配了城市空间建构的变化。传统城市，如果将其视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缘空间，早期的城门与港口，就是城市的拥有者控制城市内部

和外部的交换和流通的闸口，道路，则是速度得以达成的脉络。因而可以说，传统城市的空间是围绕着城门、港口和道路而建立，尤其是在“速度”有限的情况下，城门和港口可以作为实存性的障碍，划分出一片稳定的区域，人们也就总体固定地在一个城市的内部工作、生活，城市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隔是明显的。但是，在今天，随着汽车、火车和飞机的诞生，高速运输方式使得人与物的流通速度得到极大提升。城市开始围绕着车站、机场和高速公路而运转，城市在空间维度的内外之隔也开始松动，人们可以居住在外省，却选择每天去巴黎的公司工作。当有了网络的瞬间性和遍在性之后，速度已然“实时”。今天的人们甚至可以“居家办公”，而他的公司大楼实际上可能远在几百公里以外。任何城市已经不可能通过一种实存性的障碍来把控速度，未来的城市将很快围绕着网络的和“通讯中心”（teleport）而建立（*Polar Inertia* 22）。

如果说，传统的城市是一种围绕着城门和港口而建立的“局域性的城市”（tropical city），维利里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就在当下，城市即意味着一种围绕着传送中心而建立的“远域性的城市”（teletopical city）（*open sky* 26）。在全球性的实时信息高速公路的联结之下，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的集中化或者趋于膨胀的问题，而是即将见证城市的“超集中化”（hyperconcentration），即全球范围内所有的重要大城市都基于此种技术语境而连成一体，一种超出所有具体城市之上的、虚拟性的“元-城市”（meta-city）诞生了。这个“元城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中心，但是，所有的现实中的真实城市，无论它多么发达，无论是巴黎、纽约亦或是上海，都受这个“元城市”的辖制，都只是它的一个郊区地带而已。如果说，传统的政治是一种以他人的实在在场的“直接性”为基础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未来的政治是一种建立在时间的“瞬间性”的基础上的“元城政治”（metropolitics）（*Open Sky* 74）。

如果对维利里奥来说，不同的人通过真实的公共空间中聚集到一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在今天，跨城市、跨国界乃至赛博空间中的交流越发频繁，以共同的稳定空间造就的聚集和交流却越发稀少，传统公共空间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越发下降，“政治”能够发生的现实环境已形于消逝，与此同时，“元城政治”正在逐步成为我们的现实。曾几何时，人们通过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而聚集，在今天，电视、电脑的流行正在让“公共空间”被“公共图像（public image）”所取代，电视机、电脑和手机的屏幕成了所有公共意见的“广场”。由共同在场的人所构成的社群在趋于解体，不在场的人反而借助于多媒体或者网络而相互连接。我们自身的身体处在消失之中，他者的身体也在消失，我们所乐意拥有的，竟然只是远方邻人的“幽灵性”（*Worst Politics* 4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1世纪后，在中国各城市中老年群体中，“广场舞”所以能够流行，也是因为它已然成为当代语境下所余不多的供人们聚集和交流的城市空间了）。“公民”概念、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将会逐渐失去其本来的意涵，“同代人”（contemporaries）概念将其取而代之。此即，曾经，我们认同另一个人和你属于同一个共同体，是因为你们同属于一个空间维度之上，而当前，我么认同另一个人，只因他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之上。

在“元城政治”的语境下，实时媒介的联结（无论是电视还是因特网），使我们在政治上产出了一种齐泽克所说的“相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How to read Lacan*）。媒体作为一种中介，已经“替代”我们自己在政治上完成了感受和思考。因为媒体，我们突然对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我们也可能对一个毫不想干的对象产生了厌恶。维利里奥提到，莫斯科红场的示威者，

会特意用英文标语写出自己的口号，就是想要让西方媒体拍摄，然后令其传遍西方世界。这样，就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同情。西方观众看到以后，也似乎有这样一种“共情”幻觉，似乎也在家中和他们一起，感受到了政府压迫下的痛苦折磨和发声的需求，仿佛也不得不和他们一起抗议俄罗斯政府了。这种被“现场直播”的媒介制造出的“共情”，其煽动力要远远大于文字的滞后的、间接性的宣传。限于写作的年代，维利里奥没能直接描述今日的移动网络，但他已经预见到，实时的媒介不但可以制造“共情”幻觉，更加可以制造一种“集体参与”的幻觉。今日，经由手机及移动互联网的瞬间传播，这种“集体参与”已经成为普遍现实。移动互联网不但延续了电视的情感层面的“共情”，更加介入到多网友的行为层面——通过手机应用中的“点赞”和“转发”，不但使得这种伪“共情”的情感强度加倍，而且还制造出一种“集体参与”幻觉：“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也仿佛成了“红场示威”的一份子，因为我通过自己的“转发”，也为这个示威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当更多的人通过“远程在场”而非“真实在场”构建了联结，维利里奥却坚信，这并不会带来政治的进步。他认为，在“实时”传播的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的“政治”(Politics)。因为政治需要“时间”，需要反思(reflection)的时间，也需要拉开距离。在“实时”传输面前，人们实际上是没有实质性的“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的，有的只能是“公共情绪”(Public Emotion)。今天，人们在看电视抑或是使用手机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投票了。人们不会再有时间去“反思”，因为在“实时传输”的压倒性力量面前，无论公众还是政府机构，根本没有空间去反思，能做的只能是瞬间的反射和即时的回应。任何的议题，一旦在大众媒介的范围内引起了“公共情绪”的共振，议题的探讨空间就已经走向了终结，将不再有任何回旋和讨论的余地。当代政治现实中，实例已经屡见不鲜。在叙利亚难民危机中，当一张叙利亚男孩的凄苦照片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激起了网友一致的同情，欧洲政府引渡难民的选择也就必然成行了。同样，在中国2018年针对一位著名学者早年涉及性侵学生的新闻事件中，经由移动网络的推波助澜和众多网友的一致声讨，在调查过程实质上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该学者任职的大学就已经在舆论压力下，被迫“提前”公布了对他的处分决定。这当然不是说，媒体所推动成行的最终决策一定错误，甚至舆论压力能使得官僚化的程序阻碍被部分规避，促成了公正结果的早日出现，但是这一决定形成的过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在“集体决策”的幻象之下，每个人都可能以为，自己做出的判断和决定是正确的，坚持独立思考的少数人的声音反而很容易被网络舆论迅速地淹没或压制。若是在未来的某天，舆论被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所误导，走向错误的方向，后果将不堪设想。最终如维利里奥所说，它不会带来真的民主，却可能带来一种“实时暴政”(tyranny of real time)。

同样，实时传输的速度也不会带来政治不平等的消解，而只是从一种不平等走向了另一种不平等。曾经，因为交换和流通的速度极为有限，传统城市空间的部署是一种地缘空间，空间的区隔，比如城内/城外、城市/乡村的对立，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区隔当然也带来一种不平等，空间曾经成为区分人口的尺度，人口被区分为“城内人口”与“城外人口”，“城市-乡村”这一二元对立，既意味着一种发展程度的高低之分，也对城外之人构成了一种永恒的吸引，因此也便有了“外省人”要费尽心力融入大都市巴黎这样的常写常新的小说题材。然而，在今天，维利里奥提醒我们，空间维度上的区隔看似消解了，比如，今天资本主义的权贵阶层早已不住在市中心了，反倒是市中心的遍布了各种贫民窟，但是我



们要注意的是，“时间”这一维度却变成了区分人口的新的尺度。在“元城政治”的条件下所谓的两极分化，不再是“南北对立”或者“城乡分化”，而是两种“时间性”的分化，绝对的时间性和相对的时间性将人们划分为两极，一极是引领“实时时间”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另一极是只能与“相对时间”同步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抑或是，一极是生活在“世界时间”中的权贵阶层和政商领袖们，另一极是生活在“本地化时间”中的平民们（*Open Sky* 71）。

“元城政治”不单单是架空了城市自身的真实空间，也架空了城市内部政治机构和商业机构的真实空间，比如，公司，曾经首先意味一个办公大楼、一个具体的工作地点，以便约束所有员工在上班时间待在其中完成工作，但在今天，有些公司自豪地声称，他们的员工充分享有可以“居家办公”的“自由”。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有了网络，使得部分工作可以不必固守于如公司大楼这样的具体地点才能完成。但维利里奥指出，“远程办公”看起来使得员工摆脱了诸多的束缚，不需要在通勤中花费时间，甚至连“八小时工作制”的考勤都不再需要，但是这绝不是对员工的解放，而只能是带来更深层次的控制。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它高度的移动性（mobility）和遍在性（ubiquity），只会让工作和休息之间的界限彻底消失，人们将永远为工作的阴影所笼罩。此种当代的“正应其时”（just-in-time）的生产机制，它所要求无产者、员工阶层必须具备“超级-反应性”（super-responsiveness），工作指令随时随地都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也别无选择，必须随时、随地对下达的指令做出回应。以中国为例，当微信（we-chat）应用深度介入到国人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我们不得不佩服维利里奥的预见性：有了微信以后，领导层可以随时下达指令，下属也就只能随之执行，而不敢给自己留下任何缓冲和迁延的空间。网络实时所带来的不是解放，实则是对无产者时间的进一步压榨，一种更为紧密、更加无缝的管理。

#### 四、Web 2.0 的新变：作为参照的基尔特·洛文克

维利里奥的网络论述在媒介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鸣。然而，在荷兰学者、网络研究者基尔特·洛文克看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媒介研究”或者“文化研究”，无论是麦克卢汉、鲍德里亚以及维利里奥，他们的著作当然在其出版的年代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已然无法跟上到这近二十年来（即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网络技术的环境巨变，也不能够提供真正的洞见给已经处于推特、脸书和“维基百科”时代的当代人（*A Critique of Social Media*, 78）。他们的理论当然能够切中部分现实，但不足以处理当代网络技术的巨大变化。基尔特认为，当前的我们已经处在了新的技术语境之中。这二十年中，网络技术的内部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巨变，即从“Web1.0”时代进入到“Web 2.0”的时代。这一转变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更新和迭代，而是网络语境的一次质变。如果我们不能进入这一新的技术语境的内部，“网络”一词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停留在本质问题外围的空洞能指，任何针对它的理论文本也就会成流于浮泛的批判口号。因而，我们不妨直接从当前的网络现实入手，深入到技术问题的内部，构建全新的批评框架。基于此种理由，本文这一部分将介绍基尔特的媒介批评，尤其是要呈现其关于社交媒体的论述，以此为参照来反思维利里奥对于网络中社交问题的讨论的不足之处。

首先，我们需要简要地概括一下基尔特所谓的这一“转变”。所谓的 Web 1.0 的时代，即是“dot.com”的时代，指的是从互联网开始向大众开放的 1990 年直

至 2000 年，那是雅虎、搜狐等大型门户网站占据顶峰的时期。彼时，网民可以去网站去浏览信息，或者去使用网络公司提供的“电子邮箱”等各种服务，但是，这些信息和内容和服务的形态是由网络公司事先制作，或是通过“超链接”将别的媒体制作完成信息嫁接到网民眼前。网民因而只能通过点击和浏览，被动索取现成信息，或者购买这些服务而已。这个时代里，对这些网络公司而言，网民这个群体的“价值”就是“潜在的顾客”而已，即他们要做的就只是让这个群体心甘情愿地购买他们提供的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随着资本不断涌入这个领域，这样的技术模式和盈利模式在 2000 年硅谷的泡沫破灭之后走向了终结 (Critique 4)。随后，2001 年，人们突然发现，谷歌这样搜索引擎和 Blogger.com 这样的自媒体平台 (self-publishing platforms) 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2001 年因此被视为是硅谷的复兴之年。博客、微博客、谷歌乃至后来的推特、脸书等新一批的网络公司开始崛起，开启了所谓的 Web 2.0 时代。

相比于前一时代，这一时代网络公司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征。其一，重新架构了网络公司和网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代的网络公司中，他们不再是像上一代那样，采取一种由上至下的、单向度的、“专制化”的管理模式，而是打出了颇具民主面貌、开放精神的所谓“参与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 的旗帜：将构建自身的决定权部分交给网民，而不是交给投资公司和银行。这种“免费且开放” (free and open) 的模式看似成了网民的福音。他们不再需要为产品和服务付费，还可以参与到内容的构建之中，似乎他们的主体性由此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典型的就是“维基百科”，其中的内容不是由某个公司来事先写定，而是由众多的匿名网友共同完成。其二、重新架构了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传统的媒体，无论是电视、报纸抑或是“Web 1.0”的门户网站，都已经在这一波浪潮之下显得落后。就速度而言，手机端的实时转发胜过传统媒介。即便是 CNN 现场新闻——也许其速度同样是“实时”的，但传统新闻媒体机构的数量有限，且受制于大公司管理方式，这使得制作出来的新闻难以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形态和观点。今天的人们早已厌倦了 CNN 这样的“传统大型媒体”，而任何一个手机使用者，都可以通过“自媒体” (微博客、twitter 等) 让新闻的制作权和转发权掌控在自己手中，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让很多传统媒体再也不能成为第一手新闻的供应者，反而沦为新闻的转发者。其三、重新架构了人们的社交生活。脸书和微信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社交，它不单单是让我们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 (这在 Web 1.0 时代已经具备)，而是构建出了新的网络交往的生态，比如，“发状态”、“点赞”、“转发”、“评论”等等行为成为网络交往中新的常态，并且深度介入了我们的社交日常。

种种新特征使得我们不能沿袭传统意义上的网络批判模式。首先，在维利里奥和其它一些学者的文本中，网络往往被视为一种虚假世界，真实世界因为对它具有绝对的伦理优位，所以网络世界是值得针砭的。但这样的理由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已经很难经得起推敲。首先，当代社交媒体所构建出的赛博空间，和我们的真实生活并不是一种有你无我、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也不存在相互取代的可能，而是一种深度融合的关系。我们在微信和脸书中的好友并非都是素未谋面的远方网友，恰恰相反，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我们真实世界中的朋友、亲人、同事。我们既和他们在真实世界中发生联系，也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中发生联系。而且，在这“两个世界”中的联系并不是泾渭分明地分离开来，我们反而频繁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联结抑或转移。你的上司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给你布置真实世界中的工作，同样，你在和朋友在真实空间中聚会以后，再发一张合照到你的社交媒

体中，让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手机端重温这一瞬间。因此，在今天，已经很难再轻易地把赛博空进界定为“虚假的”，也很难就去简单地指认，社交媒体中的联系侵蚀了我们在真实空间中的联系。

再者，社交媒体并没有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形于“虚拟化”，反而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真实”、更加“透明”了。脸书和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从其诞生伊始，就是试图去“打通”、去“便利”使用者和那些与他真实生活中有交集的另一批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帮使用者“搭建”和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远方人”之间的联系管道。而且，脸书和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勾勒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我们在社交媒体中，需要建构个人形象，但这一自我形象构建不同以往，不是去扮演“另一个谁”，或是成为另外某个“更好的他者”，而是一种“后-伪饰”（post-cosmetic）的自我形象管理，即我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中“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通过此种方式建构出“可信度”。我们时刻都需要主动曝光自己的真实生活中的细节，甚至呈现自己的“缺陷”——糟糕的着装、肥胖、皮肤差等等，以此证明这就是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才能和朋友之间建立联系。这个时代的网络更多地是要求我们去管理自身“人之常情”的一面，如果我们不多多少少地暴露自己的私人生活，我们在网络中呈现出的就是一种无个性、无吸引力的机械形象，将没有人会关注我们，这等于是主动将自己放逐于社交网络之外。

鉴于此，对网络的“批判”就不能仅仅限于文化层面的“真假之辩”，不能单单以使我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耽溺为理由去批评网络交互，而是应该更加针对性地采取一种新的批评路径。从社交媒体的政治经济学层面挖掘其背后的推动力或许是其中的路径之一。如基尔特指出，Web 2.0 时代的社交媒体都打出“免费且开放”的口号，无论是脸书、推特或者微信这样的手机应用，都成为用户免费发表和制造的平台，用户可以以任何形式上传他们的内容，但是，今天的网络公司其实大多不再是像 Web 1.0 时代那样，“生产层面”的盈利——制造出产品或者服务并说服用户购买——已经不再是他们盈利的主要来源，他们盈利的重点是在“控制分布管道”这一层面。他们通过自己的应用搭建出一个便于社交的平台，用户们在这个平台之中自由搭建自己的“社交网络”。在这种具备充分自主权的生态中，用户会主动发出自己的“当日状态”，会将任何自己喜爱的文字、图片抑或视频转发给朋友，会自己对朋友的某一条状态“点赞”或者作出简短评论，这其中不需要任何专家的推荐，而是他们自己相互推荐，口耳相传。

无论是社交媒体中的点赞、评论还是转发，它们既是信息的分享，也是一种建立情感联系的行为。在这样的“实时”的生态之中，社交媒体时时刻刻都在“催促”它的使用者们，让他们第一时间把任何自视为有价值的状态、心情、和所见所想“分享”给自己的“好友”。推特、脸书和微信的朋友圈功能不停地在用户的潜意识中发问：你在干什么？现在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有趣的可以分享吗？用户因而一刻都难以喘气，就像西西福斯一样，不停地去“分享”，去“自拍”，去暴露自己的生活。但是，就是在这种生态之中，用户们并不觉察到，他们大量的发布、转发和分享的行为，构建了庞大的流量数据，同时，这些由用户自己生成的内容又反过来聚集了用户们的关注度，网络公司对这些数据的后台分析、以及这种凝聚海量用户目光的“关注度”自身，都可以直接被卖给广告商，成为网络公司新兴的盈利模式。用户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之间，在他们乐此不疲地发出一条又一条内容的时候，他们在网络中的社交活动，已经被脸书或者微信“货币化”了。他们其实让自己成为了网络公司的免费劳动力，而脸书或者微

信就因此成了这场游戏里的真正赢家。

那么，有没有抵抗这种技术生态的可能呢？我们可以主动选择向这种社交媒体说不吗？有人提出，既然一切都是因这些网络公司和网络应用而起，不妨直接断绝这些网络的使用，不再使用脸书和微信，直接过一种“线下”（off-line）生活？基尔特已经看到，这种卢德主义式的建议，在社交媒体已跟真实生活深度融合的情况下，难以行得通。如前文指出，这些应用联结的不单单是从未谋面的“网友”，更多地是真实生活中的朋友、同事等等。在此情况下，当全公司的领导和别的同事都通过“微信”组织工作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普通员工，根本没有任何自外于这一网络应用的可能，如何还能有勇气将手机中的社交应用卸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尔特指出，在今天，真正意义上的“线下”生活是奢侈品。平民阶层若想在现代社会生存，很难完全告别手机和移动网络。只有处在这个社会顶尖阶层的小部分人才有完全不使用手机却不被社会抛弃的特权——比尔·盖茨和马云是可以不使用手机的，特朗普和梅伊不使用手机也依然是一国首脑——虽然他们完全买得起，或可能正在使用手机。反倒是普通的劳工阶层，时刻不敢让手机离开身边，时刻都要拿出来看一看，有没有遗漏某一条“重要信息”。因此，今日，社交媒体与当代社会的权力结构、阶层分野完美地达成了共谋，作为普通的一员，直接让自己隔绝于社交媒体极为艰难，这意味着经济的分层、权力的分层带来的对大部分普通人的钳制在网络世界中也从来都没有消失。

不过，基尔特的论述显然还是不够的，它并不能道尽“微信”这类中国式社交网络的复杂性。如果说，基尔特强调，“脸书”迫使我们不得不展露自己的“真实面”，否则就会在社交媒体上“不受欢迎”，但是，在中国，问题的复杂在于：“微信”在推出的初始阶段，其“朋友圈”的功能与“脸书”的社交属性确实是类似的，人们为了让“好友”的目光瞩目于自己，也要展露自己的私人生活、展露自己的“缺陷”，展露自己对于生活的“一己感受”，然而，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真实生活中朋友、亲人乃至同事、领导都“加入”到微信“好友”中，其中的情形就不那么简单了。“微信”的“朋友圈”的“初衷”本来是和“脸书”一样，是构建一个私密的“圈”，少数值得信任的“朋友”加入这个“圈”，这样，微信的使用者可以向“好友”无顾忌地发布自己的“状态”。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你的微信“好友”中，基于对于中国式关系的担忧，微信的使用者在发布每条“状态”之前，又不得不又犹豫起来：当公司领导也在我的朋友圈之中，我还能真实地发布对于工作的抱怨吗？当我想要发布自己对张三的“不满”时（即便他不在我的“朋友圈”之中），我却要顾忌到，他的好友李四却在我的“朋友圈”之中（因为我和李四的关系还不错），李四会不会告诉张三我对他的埋怨？“我”不得不在发布每一条状态前进行“自我审查”，把所有“不适合”公之于众的状态回避。进而，“我”发现自己还是不能“完整”展现自己的“真实”，于是只能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中：一方面，基于对于中国式关系的复杂性的担忧，不能完全展示自己的真实面，另一方面，基于“社交媒体”的特性，又不能让自己完全“沉默”，否则，自己有可能则被这个虚拟的社交网络彻底边缘化。

因此，此时的问题不在于基尔特所说的是不是“被迫”要展示自己的“真实”，而是在于，我虽然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却只能“策略性”展示自己的“部分真实”，或者一种修饰后的、乃至扭曲后“伪真实”。但是，这样的经过“编辑”后的“真实”还是“真实”吗？作为一种“社交媒体”，微信的“意义”何在？于是，今天的人们反而开始怀念“论坛”这一属于 WEB1.0 的时代的社交工具了，起码，“我”可以用一个虚拟的身份，和一群与自己真实生活没有任何交集的“远

方人”吐露心迹。因此，现在的问题早就不是“虚假”侵蚀“真实”，反而是“真实”侵蚀了“虚假”。也正是基于对这一类中国式困境的洞察，当然也是为了避免自身的软件的“社交”特性被这一中国式语境侵蚀，“微信”早就推出了“分组发布”的功能（发布者可以选择让一部分好友可以看到这条状态，另一部分“好友”则不会见到）。但是，无论如何，属于中国人的“说”的“困境”，在“微信”中一直存在着。如果真像王尔德所说，“戴上了面具，人才能说真话”，“微信”的问题在于，它和真实生活的“过度重叠”，使我们的“面具”被破坏了，我们反而跟真实生活中一样，不敢、也不能说真话了。我们恐怕还得重新找回自己的“面具”。

## 结语

维利里奥基于他自身的身体现象学视角，向我们指出，当今的实时网络制造出一种新的“近缘”，即脱离了真实空间的“电磁近缘”。它颠倒了我们的社群体验，我们开始疏远身边人，却开始和赛博空间中的远方人更加“亲近”。这种“颠倒”不单单是在视听层面和情感交流层面，更加介入了我们的身体层面：借助于联结身体的种种工具而形成的“网络性爱”就是最为极端的呈现。当我们的社群体验被颠倒，我们所居住的空间中的政治生态也就被改变了。以往的政治是和生活在同一真实空间的人们共同做出讨论与抉择，而在基于网络的实时传输的“元城政治”中，人们不过是通过手机和电脑的屏幕做出了政治选择。正是这种意义上，维利里奥的警告值得我们深思。当然，限于写作时代和自身思想背景的原因，在网络文化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未能为维利里奥所捕捉到，故而我们仍然需要参照基尔特等当代学者的视角，对维利里奥的理论做出一定的补充和商榷。